

# 战略克制：大国实现和平权力变迁的关键

赵懿黑

**【内容摘要】** 当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即一个国家的国家力量增长速度长期快于其他国家时，大国间容易爆发冲突乃至战争。而和平权力变迁的实现，要求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同时采取战略克制。崛起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能否避开有利于向守成国家投送军事力量的区域，以限制其攻击能力；守成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能否合理定义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核心势力范围，这将决定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历史上主要的大国权力变迁案例，即1891—1904年日俄间的权力变迁、1870—1914年英德间的权力变迁、1841—1926年英美间的权力变迁、1923—1941年美德间的权力变迁，均可验证上述主张。

**【关键词】** 权力变迁 权力转移 地缘政治 战略克制 安全利益

**【作者】** 赵懿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30）

当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国际体系往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国家间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如何维持权力变迁期间大国间的和平，是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问题。学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家的动机和战略，认为崛起国家的战略选择是决定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忽略了对守成国家战略的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和平权力变迁的实现，同时取决于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是否采取战略克制。如果守成国家采取战略克制，合理定义“国家安全”，仅将必要的区域划为核心势力范围；同时崛起国家也采取战略克制，避免向战略区域扩张影响力，那么两国实现和平权力变迁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相反，如果守成国家拒绝战略克制，无限扩大确保其“国家安全”所需的核心势力范围；或者崛起国家拒绝战略克制，向便于投送军力的地区扩张，那么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 战略克制与权力变迁的理论机制

本文所说的权力变迁 (power shift) 是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之间发生的相对国家力量<sup>①</sup>的长期变化。简单来说, 是指一个大国的国家力量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另一个大国。两个大国的国家力量可能同时都在增长, 但如果其中一个大国的国家力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那么这两个大国之间就发生了权力变迁。<sup>②</sup>其中, 国家力量增长更快的为崛起国家, 相对较慢的为守成国家——本文定义“守成国家”时, 只考虑国家力量的相对增长速度, 并不考虑大国的国际地位、动机等其他因素。需要强调, “权力变迁”不考虑国家力量增长的结果。即权力变迁结束时, 崛起国家的国家力量并不一定超过守成国家。当一个大国的国家力量不仅相对他国以更快速度增长, 而且“其国家实力已经超过或者即将超过守成国家的国家实力”, 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是“权力转移” (power transition)。<sup>③</sup>也就是说, “权力变迁”仅考虑国家力量的相对增长速度; 而“权力转移”不只考虑国家力量的相对增长速度, 还要关注权力变化的结果。

权力变迁期间, 如果守成国家感到威胁, 冲突容易发生; 如果守成国家未感知到威胁, 和平易于维持。守成国家是否会对崛起国家感到威胁, 不仅取决于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 也取决于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换言之, 守成国家是否受到威胁, 同时取决于崛起国家能够攻击到的范围, 以及守成国家定义的对国家安全重要的范围。而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以及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 分别取决于两国是否采取战略克制。该理论的机制可以概括为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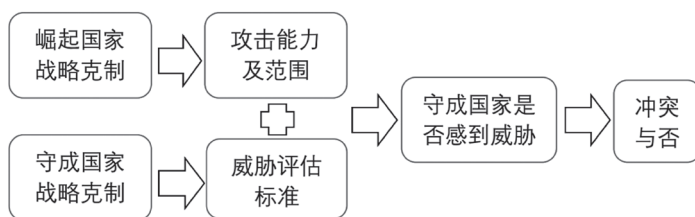


图 1 战略克制与权力变迁的理论机制

首先, 如果崛起国家采取战略克制, 限定扩张的程度和方向, 即避免向重要战略区域扩张, 那么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将受到地缘政治条件的限制。一个国家投送军事力量时, 如果必须通过自然障碍或缓冲区, 或面临其他大国的拦截, 则需要消耗大量的军事力量。<sup>④</sup>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难以被投送到特定地点, 那么其军事能力将无法转换为攻击能力。正如战略家威廉森·默里 (Williamson Murray) 所说: “世界上最好的军事组织, 如果不能到达战争区域……那么根本不值得一提。”<sup>⑤</sup>在这种情况下, 崛起国家攻击守成国家的能力将受到限制, 那么, 守成国家感到威胁的可能性较小。相反, 如果崛起国家拒绝采取战略克制, 向便于投送军力的战略区域扩张, 随着崛起国家的国家能力及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 其攻击能力也将快速增长, 那么, 守成国家感到威胁的可能性较大。

其次, 守成国家的战略克制, 将决定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 (threat assessment criteria), 即崛起国家能将军力投送至何处时, 守成国家将判断其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历史上的大国倾向于无限扩张, 最大化其势力范围, 以确保绝对的安全。<sup>⑥</sup>当守成国家采取战略克制时, 即仅将必要的区域定义为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核心势力范围, 守成国家不易感到威胁。相反, 如果守成国家

拒绝采取战略克制，无限扩大核心势力范围，期望在世界所有区域确保主导权，那么守成国家易于感到威胁。

因此，权力变迁期间，如果守成国家拒绝采取战略克制，无限放大对安全的要求，那么即使崛起国家限制扩张的区域和范围，守成国家也很可能感到威胁，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存在。同样，如果崛起国家拒绝战略克制，扩张到战略价值高的地区，即使守成国家仅将必要地区定义为国家安全需要的区域，守成国家也可能感到威胁，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会存在。只有当双方均采取战略克制，崛起国家限制扩张的区域，同时守成国家界定的核心势力范围也有限，那么守成国家倾向于判断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未威胁到自身国家安全，两国之间维持和平的可能性较大。

下面，本文将分析历史上主要的大国权力变迁案例，即1891—1904年日俄间的权力变迁、1870—1914年英德间的权力变迁、1841—1926年英美间的权力变迁、1923—1941年美德间的权力变迁，以验证这一理论机制。

## 1891—1904年的日俄关系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力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后，也开始效仿西方国家进行改革。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由此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19世纪90年代，在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的带领下，俄国兴建铁路，提高关税，保护新兴工业，改良金融体系，鼓励西方投资商利用先进技术在日本兴建工厂。这一系列改革推动了俄国工业化的发展，俄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升。<sup>⑦</sup>自1891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俄国。1891年日本能源消耗占两国能源消耗总量的33.65%，这一比率1903年下降至23.59%，1904年为24.21%。<sup>⑧</sup>

日俄权力变迁期间，俄国不断向中国东北扩张。1896年6月，俄国与清政府签署条约，同意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段从中国东北通过，同时允许俄国派驻军队保护铁路，并给予俄国铁路相邻土地的行政权。1898年俄国进一步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影响力。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25年的租借权，以及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在大连建立商业港口的权利。俄国还被允许建立另一条铁路，连接大连和哈尔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俄国以帮助镇压为借口，向中国派遣军队。事后俄国拒绝撤军，占领了中国东北，由此将其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仅如此，俄国也有向朝鲜半岛扩张的意图。甲午战争后，俄国拒绝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主导权。日俄经过多年谈判，于1896—1898年签订一系列协议，其中，俄国只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经济和工业利益，拒绝日本行使任何政治或军事权力。<sup>⑨</sup>之后，俄国不断试图在朝鲜半岛获取土地租借、建造铁路的权利，以及占有木材资源和渔业资源。<sup>⑩</sup>

另一方面，日本在制定威胁评估标准时，也没有采取战略克制的态度，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均被日本定义为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区域。首先，日本认为，朝鲜半岛是插在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日本元老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的概念，主张日本不仅需要守护“主权线”——国境线，还需要守卫“利益线”——一条包括日本邻近土地及区域的线，其中包括朝鲜半岛。<sup>⑪</sup>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也认为，如果朝鲜半岛落入他国的势力范围，那么日本的敌人会太过接近日本。<sup>⑫</sup>当时日本内阁的首要政策目标，就是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其次，日本认为，中国东北也是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的区域。日本意识到，中国东北将为俄国提供向朝鲜半岛投送力量的地缘条件，因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主导将威胁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桂

太郎相信，俄国占领中国东北的时候，无论其作出怎样的承诺，都将不可避免地将其势力扩张到朝鲜。<sup>⑬</sup>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也强调：“如果满洲成为俄国的财产，那么朝鲜也无法保持独立。”<sup>⑭</sup>

由于日本认为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主导对其安全至关重要，而俄国又不断向这两个区域扩张，日本在权力变迁期间感到了俄国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意识到其国家力量的相对衰退，认为必须尽早地进行与俄国的战争。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强调，日本需要立即发动战争，而不是“等待国家的衰退”，以防俄国有更多时间增强其力量。<sup>⑮</sup>最终，日本于1904年对俄国发动了战争。

## 1870—1914年的英德关系

### （一）德国的崛起与英德和平（1870—1889年）

随着1870年普鲁士战胜法国，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德国的国家力量快速增长。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1870年12月写道：“我有一种担忧，这一巨变将使我们的状况从坏变为更坏。”<sup>⑯</sup>1870年德国的能源消耗量占英德两国总量的22%，1878年该占比提高到25%，1884年为30%，1889年为33%。<sup>⑰</sup>但在这一期间，德国国家力量的增长并没有导致英德之间的对立和纷争。

首先，这一期间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采取了极度克制的战略。俾斯麦对海外殖民地基本没有野心。1871年，当有人向俾斯麦建议占领越南或者本地治里时，俾斯麦回答：“我根本不在意殖民地。它们只不过相当于补给站。”<sup>⑱</sup>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对殖民地的追求会导致英德矛盾；比起占领殖民地，俾斯麦更乐意见到其他欧洲大国为争夺殖民地而相互仇视，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欧洲分散到其他地区，由此避免反德联盟的形成。<sup>⑲</sup>

由于德国国内对殖民地的要求及压力，俾斯麦不得不获取一些殖民地时，他的扩张也采取了最为谨慎的态度。19世纪80年代，德国占领了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德属喀麦隆、多哥、德属东非（今坦桑尼亚）、新几内亚东北部等地。这些地区难以为德国提供便于投送军力的战略基地。

其次，英国在进行威胁评估时也采取了战略克制的态度。英国的传统政策是“光荣孤立”，即只有当某一国家过于强大，或者英国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或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威胁时，英国才干预欧洲政治。换言之，英国领土以及关键海洋通路是否受到威胁，是英国评估威胁的标准。相比占有几处殖民地的德国，法国和俄国对英国海上通路的威胁更大。俄国要求掌控达达尼尔海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并试图在波斯扩张；法国不断与英国争夺埃及的控制权，威胁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sup>⑳</sup>1888年2月，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写道：“我们的政策和同盟国（Central Powers）的一样。英国和德国，以及很大程度上奥地利，都是‘满意’的国家。法国和俄罗斯是‘饥饿’的国家。”<sup>㉑</sup>换言之，英国并没有将德国认知为海洋国家，也没有感知到德国的威胁。

结果，这一期间英德关系良好。即使德国不断崛起，英国也愿意在殖民地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德国的友谊。英国对德国在非洲的有限扩张采取包容态度，并于1885年、1890年与德国达成一系列协议。<sup>㉒</sup>

### （二）英德冲突与“一战”的爆发（1890—1914年）

这一期间，英德之间的权力变迁持续。1890年德国的能源消耗占两国总量的33%，1900年为40%，1908年为45%，1914年为47%。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上一时期（1870—1889年），德



国国家力量的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上一时期德国能源消耗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而1890—1913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sup>②</sup>但这一期间英德关系交恶，最终走向战争。

随着1888年威廉二世上台，1890年俾斯麦卸任，德国的战略发生变化，拒绝继续采取战略克制。德国开始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不仅要求获得“在日光下的地盘”，还进一步要求获得对海洋的控制能力。正如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Karl von Bülow）解释的：“它（海洋）已成为一条生死攸关的神经，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蒸蒸日上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变成一个老气横秋、衰朽的民族，我们就不能允许这条神经被割断。”<sup>③</sup>

为此，德国不断试图向重要海上通道的沿岸及战略性海军基地扩张。首先，德国企图向土耳其扩张。1899年，德国获得了巴格达铁路的租让权。这是土耳其境内的一条连接欧洲、穿越小亚细亚半岛、经巴格达到波斯湾的铁路。这条铁路如果建成，不仅会将土耳其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同时还将威胁到英国对波斯湾的控制。其次，德国还覬覦荷兰和比利时。这对英国领土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对于德国而言，通过荷兰领土上的莱茵河是花费最少的运输路线。不仅如此，在可能的对法战争中，荷兰和比利时对于德国而言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1906年，德国资本大量渗入比利时和荷兰，并鼓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结成关税同盟，德国甚至鼓舞了威胁比利时统一和完整的弗拉芒分立运动。<sup>④</sup>

由于德国的战略转变，英国越来越感到德国的威胁。英国开始寻求与法国、俄国和解，以集中对抗德国。英国分别于1904年4月、1907年8月缔结《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并作出了一定让步，以解决英法和英俄之间的殖民地争端。这奠定了针对德奥联盟的三国协约的基础。随后，欧洲形成了两大敌对联盟针锋相对的国际形势。同时，英德不断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双方战略竞争愈演愈烈。

1914年“七月危机”爆发后，英国并未立即决定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但英国无法容忍德国占领法国和比利时。这是因为，德国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海岸线轻易越过英吉利海峡，向英国国土投送军事力量。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在8月2日制定行动原则时明确指出：“我们无法允许德国利用（英吉利）海峡作为敌对的基地。”<sup>⑤</sup>8月2日，英国在决定参战之前已向法国承诺，如果德国战舰驶入英吉利海峡，或德国攻打法国的海岸线或法国舰队，英国会为法国提供保护。<sup>⑥</sup>8月3日，德国为避免两线战争而攻打法国并借道比利时之后，英国决定参战，处于权力变迁时期的英德最终走向战争。

## 1841—1926年英美和平权力变迁的实现

1841年，美国的能源消耗占美英能源消耗总量的5%，1847年占比达10%，1864年为20%，1872年为30%，1882年为40%，1891年为50%，1901年为60%，1907年为70%，1923年为80%。<sup>⑦</sup>可见，美国于19世纪不断崛起；到19世纪末英美经济能力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美国的经济能力超过英国，且持续增长。美国崛起期间，英美之间持续保持着和平。

美英权力变迁期间，美国不断扩张，但美国的扩张对于英国而言，一定意义上是克制的。一方面，美国主要向美洲大陆及太平洋方向进行了扩张，这对英国的威胁较小；另一方面，英国进行威胁评估时也采取了战略克制，英国放弃了对美洲的主导，仅关注欧洲和对英国生存至关重要的海洋通道的控制权。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在中美洲地峡扩张之时,英国意识到中美洲对于英国的战略意义甚小。1842年6月,英国议员J.A.罗巴克在下院声称:“为了谋求英国人民利益的需要,我宁肯牺牲西印度殖民地。为什么不呢?那些殖民地对英国人民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1844年,该议员还说:“西印度群岛已经是这个伟大帝国的最沉重的包袱,对我们毫无用处。”英国政界纷纷呼吁政府放弃以美洲为重点的传统政策。<sup>⑩</sup>1850年,美英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同意共享拟议中的中美洲运河相关权利,这意味着英国允许美国介入中美洲事务。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美国在拉丁美洲进一步扩张时,英国则完全放弃了在美洲的权利。委内瑞拉危机时,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1896年1月4日呼吁“认真地同美国达成妥协”。1月25日,张伯伦又声称:“我们不贪图美洲的一英寸领土。”<sup>⑪</sup>美国意图开凿巴拿马运河之时,1901年英美签署条约,英国同意美国自由地建造、控制和守卫拟建的中美洲地峡运河。英国于1904年宣布:“鉴于美英关系的现状和避免对资源的无谓浪费,英国已无必要在美洲保有海军舰只。”<sup>⑫</sup>至此,英国将美洲的主导权移交给了美国,美英实现了和平的权力变迁。

## 1923—1941年的美德关系

### (一)“二战”初期德国的扩张与美德和平权力变迁的持续(1923—1940年)

美国在1923—1941年相对于德国处于衰退中。美国的GDP占美德GDP总和的比率持续变小:1923年为80.17%,1928年为75.11%,1936年为72.70%,1940年为71.13%。<sup>⑬</sup>自1938年3月起,德国开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但直到1940年5月,美国都试图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面对德国的扩张和欧洲战争,美国的基本态度是“避免风险,拒绝承诺”(no risk, no commitment)。<sup>⑭</sup>美国拒绝参与欧洲战争,是由于这一期间的美国和德国均采取了战略克制。

一方面,这一期间德国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德国没有占领便于跨越大西洋、向美国投送军事力量的区域。到1940年5月,除了挪威、丹麦以外,德国没有占领任何位于西欧沿海的地区。不仅如此,法国的独立意味着美德间存在缓冲地带,德国需要首先击败法国,才能够获得向美国投送军力的通道。

另一方面,美国的威胁评估标准为,对方能否攻击到美国的国境线。美国判断,由于大西洋的存在,德国没有能力将其军事力量投送到美国领土,因此并不认为德国的扩张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例如,1939年12月,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信件中写道:“美国的公众舆论反对美国干预欧洲事务,感谢上帝赋予我们大西洋以及太平洋。”<sup>⑮</sup>换言之,罗斯福认为,由于大西洋的庇护,即使不参与战争,美国也仍然安全。同样,美国国会议员杜威·肖特(Dewey Short)指出:“不可争辩的事实是……3000英里宽的大海存在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旧大陆国家之间的纷争……与我们无关。”<sup>⑯</sup>美国民众也相信德国没有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美国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坚不可摧”(impregnability),是当时美国民众普遍持有的信念,也是美国民众接受孤立主义的主要原因。<sup>⑰</sup>

### (二)美国的“二战”参战决定(1940—1941年)

1940年6月,法国沦陷,7月德国开始了对英国的大规模空袭,美国的政策也随之改变。1940年8月,美国决定向英国提供驱逐舰,这一政策明显不符合其原先保持中立的立场,标志着



美国支援同盟国的开始。1941年3月,英国的生存岌岌可危,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同盟国“租借”军事物资。根据国际法,美国的这一措施意味着参与战争。1941年9月,罗斯福下令执行“一旦发现德国军舰即刻射击”(shoot-on-sight)的政策,并于1941年11月得到美国国会批准。至此,美国在大西洋开始了针对德国的军事行动,正式参与了欧洲战争。美国的参战决定,改变了其长达一个世纪的孤立主义政策。这同时是由于德国的过度扩张和美国威胁评估标准的变化导致的。

一方面,自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德国的扩张政策完全失去了克制。到1941年11月,德国的势力范围已包括南斯拉夫、希腊、苏联部分领土、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芬兰。另外,如果美国不参与战争,英国的生存将难以保全,英国也很可能被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sup>⑦</sup>

这一时期的扩张,为德国提供了向美国大量投送军事力量的战略优势。首先,由于法国战败,德美之间不存在任何缓冲地区。其次,德国获得了大量便于跨越大西洋的战略港口和海岸线。德国可以利用法国和挪威的海岸线、法属西非的战略港口(如达喀尔)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的岛屿——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向西半球投送军事力量。如果英国被击败,德国甚至可以利用不列颠群岛。

另一方面,美国的威胁评估标准不再限于国境线,而是基于德国能否获得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美国认为:德国一旦控制欧洲和北非的沿岸地区,则可以不受阻碍地利用大西洋投送军事力量。罗斯福认为:“在德国的控制下,那些岛屿(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将成为潜艇、军舰、飞机的基地……它们将成为未来攻击(美国)的跳板。”<sup>⑧</sup>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也指出,德国控制相关战略地点意味着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例如,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指出:“他(希特勒)正在通过维希和非洲越来越靠近我们美国的海岸线。”<sup>⑨</sup>劳伦斯·阿诺德(Laurence F. Arnold)则解释道,美国之所以可以在1939年维持中立,是因为那是在“所有位于海岸线的国家”被德国击败之前,以及在“从挪威的最北端到西班牙整个海岸线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之前”。<sup>⑩</sup>

## 结语

综上所述,大国间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共同战略克制将有助于实现和平权力变迁。正如1841—1926年英美权力变迁期间,由于崛起国家避免了向战略区域扩张影响力,同时守成国家理性制定威胁评估标准,两国得以实现和平权力变迁。1891—1904年的日俄同时拒绝战略克制,结果大国间战争爆发。1870—1914年英德权力变迁期间,由于德国的战略转变,英德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到1889年为止,英国愿意与德国合作以共同抗衡法俄,但1900年以后,英德关系恶化最终走向战争。同样,1923—1941年美德权力变迁期间,德国的过度扩张以及美国对安全的重新定义,导致美国参与“二战”。

当前大国间权力变迁面临新的形势,美国作为守成国家,在制定威胁评估标准时,并没有采取战略克制。美国对于安全的定义方式可以概括为:第一,海洋是高速公路而不是保护国土的屏障,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美国有必要主导全球所有海域。《美国海军战略规划2017》指出,在“更为全球化的世界”中,“开放的海洋、缩小的大海,以及其他水上通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海上交通,因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海洋上”操作的能力息息相关。<sup>⑪</sup>美国认为,一旦美国的对手进入了大西洋或太平洋,就很容易利用畅通无阻的海洋,靠近美国的海岸线。因此,美国提出“深入的国土防御计划”(in-depth defense),即在远离美国海岸线的地方,发现并且

及时消除威胁,以尽可能地让威胁远离国土海岸线。<sup>②</sup>第二,美国的安全取决于美国对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主导权。美国认为,欧亚大陆的海岸线是控制进出海洋的入口,美国的手一旦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便可以利用海洋投送军事力量。美国海军制定的唯一一种赢得(与大国的)战争的方式是,在危机或冲突发生的初期,通过发现及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以及反介入/拒止系统,尽快确保制海权及主动权。这要求美国在地区前沿部署具有绝对优势的海洋力量。<sup>③</sup>

美国将其防御线画在了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将对亚太地区前沿的控制,以及远在大西洋或太平洋另一端的区域海洋的主导权,定义为美国安全的必要条件。可以说,美国过度扩大了其安全需求。美国海洋战略家杰弗里·惕尔(Geoffrey Till)讽刺道,华盛顿在制定战略时,仍保留着“罗马帝国的气质”(the aura of imperial Rome)。<sup>④</sup>

美国当前对威胁的评估方式和对安全的理解,与其参与“二战”前夕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以1941年美国参与“二战”为节点,美国彻底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开始积极干预国际事务。这种国际主义转向,是基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和定义。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已成为美国战略思维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是出于“安全”需求,制定攻势海洋战略、在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竞争其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非常大,即双方均出于安全需求而相互竞争,国家的安全需求反而增加了地区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困境,并不完全是由于国际体系的压力导致的,也不完全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变化,而是由于美国对于安全的定义以及安全线的划定方式出现了偏差。

历史上鲜有崛起国家战略克制、守成国家拒绝战略克制的案例。大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战略克制,有时是出于领导人的谋略,比如1870—1889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有时是因为特定国际结构的压力,比如19世纪同时面临多个大国崛起的英国。面对守成国家拒绝战略克制的局面,为避免冲突的爆发,崛起国家需要更加谨慎和克制,以等待历史时机。也许随着国际结构的变化,守成国家将不得不转变其战略思维、采取战略克制。

#### 注释:

① 国家力量(national power)指,一个大国强迫他国的能力或资源,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p.55-57;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p.104。

②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 1987, p.87。

③ Woosang Kim and James D. Morrow,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4, 1992, p.896, p.918; Dong Sun Lee, *Power Shifts, Strategy, and War: Declining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08, p.168。

④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p.163。

⑤ Williamson Murray, “Some Thoughts on War and Geograph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 no. 2-3,

1996, pp.208-210。

⑥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29-54。

⑦ 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大同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6—58页。

⑧ 大国GDP数据缺失时,本文用能源消耗作为国家经济能力的替代指标。能源消耗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制造基础;国家能源消耗越大,经济能力也越强。数据来源: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ersion 5.0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

⑨ Carnegie Endowment, *Korea: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21, pp.23-25。

⑩ C. I. Eugene Kim and Han-Kyo Kim, *Korea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1876-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97。



- ⑪ Roger F. Hackett, *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1838-192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58-159.
- ⑫ Sandra Wilson,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Japan: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S. W. David Wells eds.,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1904-19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163-164.
- ⑬ Ian H.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69-1942: Kasumigaseki to Miyakezaka,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Great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65-66.
- ⑭ 参见 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p.382-384.
- ⑮ 转引自 Morinosuke Kajima, *The Diplomacy of Japan 1894-1922: Anglo-Japanese Alliance and Russo-Japanese War*, Tokyo: Kajima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Peace, 1978, vol. 2, p.107.
- ⑯ William 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1871-189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1, p.13.
- ⑰⑱⑲ 数据来源: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ersion 5.0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 ⑳ Raymond J. Sontag,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871-1932*, New York: Century Company, 1933, p.25.
- ㉑ Lancelot L. Farrar, Jr., *Arrogance and Anxiety: The 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 1848-1914*,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1, p.14.
- ㉒⑳ B.M.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高长荣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10—211页,第836—838页。
- ㉓ ㉔ W.M. Roger Louis,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 Expansion in Africa, 1884-1919," in Prosser Gifford and W.M. Roger Louis eds.,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0-11.
- ㉕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02页。
- ㉖ Michael Brock, "Britain Enters the War," in R. J. W. Evans and Hartmut P. von Strandmann eds.,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161.
- ㉗ 悉德尼·布拉德肖·费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于熙俭译,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第685—686页。
- ㉘ 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60—661页。
- ㉙ S.F.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21页。
- ㉚ 转引自黄正柏、梁军:《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
- ㉛ 相关数据参见: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3; 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
- ㉜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385.
- ㉝ Elliott Roosevelt, *F.D.R.: His Personal Letters, 1928-1945*,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50, pp. 967-968.
- ㉞ United State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7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Vol. 84, Pt. 2*,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9, p.1430, p.1432.
- ㉟ 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0, p.121.
- ㊱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66.
- ㊲ Samuel I. Rosenman,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41: The Call to Battle Station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pp.181-194.
- ㊳ United State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7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Vol.87, Pt.2*,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1, p. 6938.
- ㊴ 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rming American Merchant Vessels: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7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1, pp. 33-34.
- ㊵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U.S. Navy Program Guide 2017*, January 1, 2017, Introduction.
- ㊶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1: Naval Warfare*,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March 10, 2010, p.21.
- ㊷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U.S. Marine Corps, and U.S.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Forward, Engaged, Ready*, March 2015, pp.18-26;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1: Naval Warfare*, pp.49-57.
- ㊸ Geoffrey Till, "The New U.S. Maritime Strategy: Another View from Outsid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8, no. 4, 2015, p.38.

编辑 杜运泉 杨义成